

人力政策與民意：
民眾對就業相關政策態度之實證分析

王 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動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台北大學社工系兼任副教授

學歷：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社會學博士

e-mail:kenny0900@pchome.com.tw

摘要

本文以部分就業政策為例，對台灣民眾人力相關政策態度之影響因素進行探討。近年來，尤其是金融海嘯後，台灣面臨罕見的國際不景氣與就業問題，對人力就業政策的研究更有重要性與及時性。以往對於台灣民眾困境歸因之研究非常有限，民眾之困境歸因是否會影響其對政策之態度？在學術方面，這是未探討清楚的重要問題，先進國家的相關研究不足，且缺乏明確定論，在人力資源方面，有其重要性，這類研究有助於了解困境歸因對相關態度之影響，可供規劃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人力政策是東亞發展模式的關鍵之一，與拉丁美洲等國家有明顯的區別(Deyo 1989、王方 2000)，在人力政策與發展社會學研究上，有重要的意義，故本文以就業相關政策為例來加以探討。本研究採用一項全台灣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實際完成份為 1992 份。本文以次數分配、因素分析、multinomial logit 等統計方法，並運用 SPSS 電腦統計軟體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政黨屬性與僱用身份的民眾在部分政策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困境歸因對民眾之政策態度亦有顯著的影響。

前言

由於以往缺乏運用全台灣地區的隨機抽樣調查資料，對於民眾之困境歸因態度進行統計量化的研究，因而對下列問題的了解仍不足：經濟困境歸因是否會影響台灣民眾對人力政策之態度？政黨屬性與僱用身份又是否會影響台灣民眾之政策態度？在學術方面，以上都是過去研究未充分探討清楚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政策實務方面亦有其重要性。人力政策是東亞發展模式的關鍵之一，與拉丁美洲等有明顯的區別(Deyo 1989、王方 2000)，在政治學與發展社會學上，都有重要的意義，人力就業政策也會影響社會福利與其他政策(王方 2008)，近來，台灣面臨罕見的國際不景氣與就業問題，對人力就業政策的研究更有重要性與及時性。故本文以部分人力就業相關政策為例來加以探討。

過去對民眾政策態度的研究，曾探討社會福利意識形態(林萬億 1995，王方 2001)，但忽略了與重分配態度密切相關的貧窮歸因。對重分配政策態度的研究，以往曾探討成就歸因與重分配態度(例如關秉寅、黃毅志 1997)，但也忽略了經濟困境歸因與政策態度之關係。以往一直缺乏運用全國隨機抽樣調查資料，對相關問題進行統計量化的分析。過去台灣對於困境歸因之研究非常有限，傅仰止(1994)曾探討台灣原住民之困境歸因，並比較漢人與原住民的觀點，然而以往對於經濟困境歸因之研究相當的不足。

這類研究在學術與政策實務上都有其意義，有助於我們認識各種民眾之經濟困境歸因態度，如 Sigelman and Welch (1991)所指出的：以往對弱勢團體問題的政策擬定，往往都是從優勢團體的角度來看的，而弱勢團體主要只是扮演政策輔導的對象，對弱勢團體問題的政策擬定，很少考量弱勢團體對其問題之形成是如何歸因解釋的。Kluegel(1990)也發現優勢團體對弱勢團體的同情往往不足，由優勢團體主導的保障政策或相關政策，可能難以真正改善問題。從優勢團體的角度來規劃的政策，恐怕也難以得到弱勢團體的充分支持。在此情形下，了解不同的人如何對困境歸因解釋，就有相當的意義。

文獻整理

歸因 (attribution) 可說是人們對經歷事件的主觀解釋，也可說是個體推論事件原因與性質的過程，包括對自己與他人行為原因的知覺或判斷。對事件推論原因的心理歷程，可能影響個人未來的行為。一般有關困境歸因之研究，通常可分為兩種觀點：(1)個體歸因(individualistic attributes):強調個體智能、努力與動機等內在因素。(2)結構歸因 (structural attributes): 強調機會結構等外在因素 (Kluegel 1990, Sigelman and Welch 1991)。傾向對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乃是將困境歸因於機會結構等外在因素，而非個人努力等內在因素，如此似乎較可能贊成政府提供保障與進行再分配。傾向對困境做內在歸因的人，乃是將困境歸因於個人努力等內在因素，如此似乎較不可能贊成政府提供保障與進行再分配。Heider(1958)的歸因理論亦同樣指出在解釋遭遇或行為時有兩種途徑：內在歸因與外在歸因(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內在歸因基本上是指將遭遇歸於內在的因素(例如個人條件、本身的努力、能力等)，至於外在歸因則是指將遭遇歸於外在的因素(例如外在環境、運氣等)。

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發現對經濟困境可能也有內在/個體歸因與外在/結構歸因，所謂的內在/個體歸因是指個人因素為經濟困境或貧窮的原因；而外在/結構歸因則是指非個人因素經濟困境或貧窮的原因。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發現美國人可能還有文化因素。另有部分研究(如Bullock 1999, Bullock et al. 2001, Feagin 1972)將命定的因素也納入歸因架構。故在經濟困境歸因方面的研究仍缺乏定論。Lerner (1980)指出，人們通常不是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就是相信世界是不公正的。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往往認為困境或不好的遭遇是個人自己造成的，相信世界是不公正的人。則往往認為困境或不好的遭遇是環境等因素造成的，不是個人的過失。雖然Lerner (1980)的理論不完全針對經濟困境，但其論點也隱約指出對困境可能有內在/個體歸因與外在/結構歸因。

不同國家對經濟困境歸因的研究往往有不同的發現，對美國的研究指出，美國人在經濟困境方面，較傾向內在/個體歸因，一般美國人較傾向個人應為其自身的經濟困境負責(Feagin 1972, Bullock et al. 2001)。不過，Hunt(1996)發現，美國的黑人、白人與拉丁裔的經濟困境歸因不同。對紐西蘭的研究發現，紐西蘭人在經濟困境方面，也較傾向內在/個體歸因(Feagin 1972)。然而，對英國的研究發現，英國人在經濟困境方面，不似美國人那麼強調較內在/個體歸因，而較注意到外在/結構歸因，這可能與英國的社會公平觀念有關(Furnham 1982)。對歐洲多國(如: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之跨國性研究，則發現歐洲人較常將經濟困境歸因於以下的因素:運氣不好(外在歸因)、不努力(內在歸因)、社會不公(外在歸因)等，可說內、外在因素都有。不同國家對困境歸因的研究的發現並不相同，這也顯示為何值得進行台灣的研究。

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英語系的發展中國家之研究仍較缺乏，在有限的第三世界國家研究中發現，發展中國家人民較傾向將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例如：Nasser and Abouchdid (2001)發現黎巴嫩的大學生較傾向將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教育的作用(Nasser and Abouchdid 2001)。Kluegel and Smith (1981,1986)與Nasser and Abouchdid (2001)指出不同的社會文化之經濟困境歸因不同，可能是因為社會化、教育與其他的社會政治過程。此外，政治與社會制度對民眾關於經濟困境成因之態度，也可能有影響(Furnham 1982)。

各國相關的研究發現並不相同，至今對經濟困境歸因了解仍不足，也缺乏明確一致的結論，這也顯示進行台灣研究之意義。以往對台灣地區民眾之經濟困境歸因研究相當缺乏，如能進行台灣民眾的經濟困境歸因研究，對補充相關文獻與提供未來國際研究之對話空間，都有重要的意義，這也顯示出本文的價值。

社會階層地位與歸因可能影響民眾的政策態度，國外的研究發現：少數民族、低收入、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較可能認同政府提供保障，而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較不可能認同政府提供保障 (Robinson and Bell 1978, Feldman 1983, Kluegel and Smith 1983)。即使不用自利這個觀念，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民眾的社會態度應會與其生活經驗相符 (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因此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可能較贊成政府保障弱勢；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可能較不贊成政府保障弱勢。關秉寅、黃毅志(1997)發現，成就歸因對重分配之態度有顯著影響。在社會上較弱勢者(例如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收入較低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外在歸因。相對的，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收入較高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內在歸因。在成就歸因方面越傾向外在結構歸因的人，越主張保障貧困者。而且台灣民眾在成就歸因方面有相當的共識，多數民眾在成就歸因上傾向內在歸因。

過去對民眾政策態度的研究，曾探討社會福利意識形態(林萬億 1995, 王方 2001)，但忽略了經濟困境歸因。以往也有研究探討成就歸因與重分配態度(例如關秉寅、黃毅志 1997)，但也忽略了經濟困境歸因。經濟困境歸因是否會影響民眾之政策態度？以往一直缺乏運用全國隨機抽樣調查資料，進行統計量化的分析。這類研究在學術與政策實務上都有其意義。

關秉寅、黃毅志(1997)發現，在成就歸因方面越傾向外在結構歸因的人，越主張保障弱勢者。在社會上較弱勢者(例如社會階層地位較低者、收入較低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外在歸因。相對的，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收入較高者比較可能將成功做內在歸因。在成就歸因方面越傾向外在結構歸因的人，越主張保障弱勢者。而且台灣民眾在成就歸因方面有相當的共識。

根據歷來的文獻顯示，可能影響民眾政策態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註1)：

在社會上是否居於弱勢對政策態度有影響 (Baldwin 1990, 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 Kluegel and Smith 1986)。以往文獻有關弱勢因素較常見的變項為族群、階級、收入、教育等。國外的研究發現：少數民族、低收入、階層地

位較低者，通常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可能認同政府保障弱勢者，而階層地位較高者，通常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不可能認同政府保障弱勢者 (Feldman 1983, Huber and Form 1973, Kluegel and Smith 1983, Robinson and Bell 1978)。Huber and Form (1973)也發現高收的白人，比低收入的白人與黑人，更不主張政府保障弱勢者。除了少數的例外(如 Form and Hanson 1985)，多數研究都發現，較弱勢者，較可能認同政府提供保障。如前述，即使不用自利或弱勢的觀念，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民眾的社會態度應會與其生活經驗相符(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因此較弱勢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贊成保障弱勢者。較居優勢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不贊成政府保障弱勢者。關秉寅、黃毅志(1997)曾探討民眾之成就歸因與政策態度受何因素影響，其自變項包括階級位置(類似本文之僱用身份)、收入與教育等，結果發現階級位置與教育對成就歸因與政策態度有顯著的影響。

以往的研究發現階級位置可能影響政策態度(關秉寅、黃毅志 1997)。參考 Wright (1979)、Wright and Perrone (1977)，按照為自己或為他人工作？是否有僱人工作或購買其他人的勞動力？是否有管理或控制其他人的勞動力？是否為家裏親人工作？本書各章分為幾種階級位置：雇主(為自己工作並且有僱用人，類似資本家)、自營工作者(為自己工作但沒有僱人，類似小資本家)、家屬工作(為家裡工作者，但不包括家庭主婦)、勞工(不為自己工作、不為家裡工作者、沒有僱人也沒有管理人的工作者)、經理(不為自己工作、不為家裡工作者，沒有僱人但有管理人的工作者)。為突顯不同勞動者之勞動僱用管理身份，本文以僱用身份來稱呼此階級位置之劃分。從這劃分中亦可約略看出僱用身份之強弱勢，例如，在僱用身份方面，勞工與經理比雇主弱勢。僱用身份不但與階級位置有關，更是獲得社會資源的重要變項。

再者是政黨屬性，過去的研究發現政黨屬性對一個人的政策態度有影響。Cook and Barrett (1992)對美國的研究指出，民主黨的支持者比共和黨的支持

者較認同政府提供保障與減少不公。Ladd(1985)亦有類似的發現。林萬億(1995)對臺灣的研究發現，民進黨的支持者在制度性福利意識形態上，強於新黨支持者，而新黨支持者的制度性福利意識形態又強於國民黨的支持者。王方(2001)發現：與國民黨的支持者相比，民進黨支持者的社會公平意識形態較強，與國民黨的支持者相比，民進黨的支持者與無明顯政黨支持的民眾，其經濟個人主義較弱。新黨支持者的福利意識形態，則不易與國民黨的支持者顯著區分，這或許由於新黨領導精英原多出自國民黨，而新黨在社會福利議題上又較少提出特殊主張之故。由此來看，民進黨支持者對社會公平的滿意程度可能與國民黨的支持者不同，民進黨支持者對政府提供保障與減少不公的態度也可能與國民黨的支持者不同。作者(Wang 1994)指出各黨傳統政策之不同，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因素。然而，以上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的差異，究竟是基於政黨意識形態之不同，或者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差異，不易確定。林萬億(1995)、王方(2001)都是運用1990年代的資料，當時國民黨是長期的執政黨。隨著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政黨輪替，民進黨成了執政黨，而國民黨成了在野黨，不同的政黨屬性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政策態度，值得研究。本文運用的問卷調查資料，正是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兩年後所做的。

此外，教育是另一常見的社經變項。教育雖與弱勢因素有關，但教育的影響相當特別，一方面，教育程度較高，社會地位可能也較高。然而，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由於社會化的過程，現代教育使人逐漸學到社會公平等價值觀(Kluegel and Smith 1986, Nasser, Singhal and Abouchid 2005)，故教育與僱用身份、收入等變項未必相同，未必能混為一談，因此本文將特別檢驗教育之影響。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可能接受社會公平的價值觀，因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可能贊成政府保障弱勢者。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較不贊成政府保障弱勢者(Hyman and Wright 1979, McClosky and Brill 1983, Robinson and Bell 1978, Sullivan et al. 1982)。不過，

Robinson and Bell (1978) 的研究顯示，教育與公平價值觀究竟是何關係，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異。Jackman and Muha (1984)則發現不同情境下，教育程度對態度的影響可能不同。究竟教育對政策態度之影響為何?本研究將加以探討。

年齡對相關政策態度的影響，過去的研究發現較缺乏定論。有研究認為整個歷史的潮流是逐漸趨向社會公平的 (Beteille 1969)，因而年輕人較可能強調社會公平，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較可能贊成政府提供保障與再分配。年齡較大者，則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不贊成政府提供保障與再分配。不過，王方(2001)對台灣的研究，發現年齡對相關社會政策態度的影響並不顯著。當然我們應知道，年齡對態度的效應不易與世代 (cohort) 的效應區分 (Mayer 1992)，這是社會科學界普遍面臨的問題。

不少受到廣泛引用的研究在檢定個人背景因素對民眾態度之影響時，曾使用性別、年齡、教育、僱用身份或階層等變項(如: Bobo 1991, Hasenfeld & Rafferty 1989)，國內一些研究(如: 王方 2001、林萬億 1995、關秉寅、黃毅志 1997)也曾運用類似之背景變項於台灣，檢定背景因素對社會態度之影響，結果顯示這種做法基本上可適用於台灣。檢定社會階層因素對社會態度之影響，結果顯示這種做法基本上可適用於台灣。不過他們普遍缺乏同時探討經濟困境觀歸因之影響，而這正是本研究的特殊之處。

林萬億(1995)另發現，婚姻狀況不同，在部分政策相關態度方面也有差異。此外，由於省籍在台灣是基本背景變項，且有研究發現省籍與政黨屬性有關，王甫昌(1997:269)即指出外省民眾對民進黨的支持一向較低，所以不少關於政策態度之研究都將省籍列入自變項(如:關秉寅、黃毅志 1997)。故本文在探討政策態度時，將婚姻狀況與省籍列入自變項。不過以往的研究普遍缺乏同時探討經濟困境歸因對政策相關態度之影響，這正是本研究的創新之處。

以往經濟困境歸因研究中發現，對經濟困境較傾向內在歸因者，對窮困者也

較傾向負面的態度。相對的，對經濟困境較傾向外在歸因者，對窮困者也較傾向正面的態度(Bullock et al. 2001, 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經濟困境歸因對相關政策之態度，有何影響? 值得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採用中央研究院所做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計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2 開始進行，至 2004 年暑期釋出資料)的定期調查。其抽樣範圍為全台灣地區，其抽樣採抽取率與抽取單位大小成比例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的方式，該調查將台灣地區 18 歲以上之成年人口作為調查對象，有效樣本為 1992 份，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計劃是近年來較嚴謹的全台灣地區之隨機抽樣調查，有相當的代表性，且罕見的包含困境歸因與多種相關題目，故加以採用。不過，人力政策包括極廣，並非一次調查所能囊括，故本研究所謂的人力相關政策，僅限於該次調查曾問到的就業政策相關題目，也就是本研究變項中所提到的幾項政策，這是本文不得已的限制，也是在運用本研究結論時應注意的。本研究運用次數分配、因素分析、multinomial logit 等統計方法，並配合 SPSS 電腦軟體進行分析。本研究將以統計方法，檢驗各假設。

研究假設：

- 一. 僱用身份較弱，較認為政府在人力就業政策上的努力不夠。
- 二. 教育程度不同，對政府在人力就業政策上的努力已足夠之態度不同。
- 三. 由於調查當時民進黨為執政黨，故假設國民黨支持者比民進黨支持者，較認為政府在人力就業政策上的努力不夠。
- 四. 傾向對經濟困境作外在歸因者，較認為政府在人力就業政策上的努力不夠。

變項測量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要分析的依變項及自變項做界定：

政府在人力就業相關政策之態度：指的是受訪者對以下問題之態度，如：

「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

「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

「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

為了分析同意 VS. 不同意、同意 VS. 無意見、不同意 VS. 無意見，在 multinomiallogit 處理時，將答案分為同意(包括同意與很同意)、無意見、不同意(包括不同意與很不同意)。

自變項

性別：在迴歸分析中以男性為 1，女性為 0。

籍貫：分為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外省(大陸各省)人及原住民等四類。在迴歸分析時，以本省閩南人為參照組。

年齡：依據受訪者實際足歲作測量。

教育程度：將個人教育區分為國小及以下、國中(含初中等)、高中(含高職等)、大專以上(含技術學院等)。

僱用身份：即勞動受僱管理身份，從中亦可看出階級位置。不同的領域可能分類之方式不同，本研究參考社會學界常見的分類方式(關秉寅與黃毅志 1997、Wright 1979、Wright and Perrone 1977)，按照為自己或為他人工作？是否有僱人工作？是否有管理他人？是否為家裏工作？分為以下幾種：

雇主：為自己工作並且有僱用人，或可稱為資本家。

自營工作者：為自己工作但沒有僱人，或可稱為小資本家。

家屬工作：為家裡工作者。

勞工：不為自己工作、不為家裡工作者，沒有僱人也沒有管理人的工作者。

經理：不為自己工作、不為家裡工作者，沒有僱人但有管理人的工作者。

收入：以問卷中全家每個月收入之答案作為衡量。

經濟困境歸因：本研究對受訪者的經濟困境歸因之測量，是依據問卷中，受訪者對一個人之所以會窮困之八項可能原因，如：努力不夠、運氣不好、能力才智不夠、隨意用錢、家庭背景不好、身體不好、沒有工作機會、社會對他不公平。其衡量的尺度依其回答重要之程度可分為：1 為很不贊成、2 為不贊成、3 為無意見、4 為贊成及 5 為很贊成，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對於該選項愈贊成。

婚姻狀況：可分為已婚、未婚、失去配偶(離婚分居或喪偶)，由於同居人數只是個位數，本質與法律上又與已婚、未婚、離婚或喪偶不同，故將之去除。

政黨屬性：根據其目前參加的政黨主要可分為國民黨、民進黨與無黨。由於其他選擇，如：親民黨、台聯、新黨、建國黨、其他政黨等不是沒有受訪者勾選，就是人數只個位數，故在分析時將其去除。

研究發現

(一) 次數分配

表 1 為台灣地區的民眾對經濟困境歸因態度之次數分配。台灣地區的民眾對經濟困境歸因贊成與(含很贊成)比例最高之前三項依序是：因為他(她)不願意工作、隨意用錢、努力不夠。而此三項在稍後的因素分析中皆屬內在歸因。而台灣民眾對貧窮歸因贊成與(含很贊成)比例最低之前三項依序是：社會對他不公平、命運不好、家庭背景不好。而此三項在稍後的因素分析中皆屬外在歸因。表 2 為台灣地區的民眾對勞動相關政策態度之次數分配。由表 1 可以看出，民眾認為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內在因素的比例，基本上要高於外在因素的比例，這顯示台灣地區的民眾對經濟困境較似乎較傾向做內在歸因。

表 1：台灣地區民眾對經濟困境歸因態度之次數分配表：

<u>您暫不贊成下列說法？</u>	很 不 贊 成	不 贊 成	無 意 見	贊 成	很 贊 成	合 計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努力不夠	1.2	28.2	3.5	52.4	12.4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命運不好	5.5	55.8	5.7	27.5	2.6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能力才智不夠	2.4	42.7	4.7	42.6	3.6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隨意用錢	0.8	18.5	3.6	57.5	16.9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身體不好	1.9	35.1	5.2	48.8	5.9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沒有工作機會	2.8	30.6	3.9	48.8	10.8	100 (N=1992)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社會對他不公平	9.3	61.3	6.3	16.3	1.8	100 (N=1992)
一個人窮是因為他(她)不願意工作	1.1	17.5	3.1	56.8	18.5	100 (N=1992)
一個人窮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好	7.9	53.9	4.0	26.8	3.4	100 (N=1992)

表 2：台灣地區民眾對勞動相關政策態度之次數分配表：

<u>您對下列的看法如何？</u>	很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很 同 意	合 計
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 工作的努力不夠	1.6	13.9	6.0	50.5	20.2	100 (N=1992)
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 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	0.8	15.3	6.9	48.9	18.0	100 (N=1992)
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 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	9.5	44.3	6.1	27.7	3.1	100 (N=1992)

(二) 因素分析

雖然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分類方式，本研究根據因素分析，將經濟困境的原因區分成內在與外在兩種主要的歸因。因素分析先以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素，接著以 Oblimin 進行斜交轉軸，並以 regression method 求取各因素分數。表 3 針對台灣地區民眾在經濟困境歸因的態度進行因素分析，可以看出民眾在經濟困境歸因方面可抽出兩個主要的因素：

因素一則包括：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好、沒有工作機會、社會對他不公平、命運不好，這些都是較外在的原因，故可稱之為經濟困境外在歸因。

因素二包括：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努力不夠、能力才智不夠、隨意用錢、不願工作、身體不好，這些都是較個體的原因，故可稱之為經濟困境內在歸因。

兩個因素共可解釋 42% 的變異量。

表 3 經濟困境歸因之因素分析 (Pattern Matrix)：

	內 在 歸 因	外 在 歸 因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努力不夠	.502	-.370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命運不好	.308	.506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能力才智不夠	.601	.158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隨意用錢	.607	-.426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好	.208	.669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身體不好	.580	.035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社會對他不公平	.208	.661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沒有工作機會	.409	.360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他(她)不願意工作	.520	-.484
解釋變異量	21.5	20.5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

以往不少相關研究都是以迴歸方處理類似政策態度變項。不過，五等態度量表是否適合迴歸處理，有其爭議，為了減少五等態度量表之爭議，本研究以 multinomial logit 來進行處理，將答案分為同意(包括贊成與很贊成)、無意見、不同意(包括很不贊成與不贊成)三組(註 2)。

表 4 為民眾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態度之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外省民眾與省閩南人相比，外省民眾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在政黨屬性方面，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無黨人士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無黨人士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發現支持假設三。此外，越是傾向對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越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或越傾向無意見而非不同意。假設四得到支持。

表 4：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 Multinomial Logit

自變項	同意 VS. 不同意	無意見 VS. 不同意	同意 VS. 無意見
男性	.178	-.017	.195
年齡	-.011	.022	-.021
外省人	.835*	-.802	1.637
本省客家人	.061	-.476	.537
原住民	14.323	-.087	14.410

收入	-.023	.023	-.045
國中	.006	-.034	.041
高中	.314	-.267	.581
大專以上	.475	.492	-.017
未婚	-.168	.124	-.291
失去配偶	-.150	-1.027	.876
自營工作者	.289	.601	-.312
經理	-.044	-.837	.794
勞工	.098	-.079	.177
家屬工作者	.169	.720	-.551
國民黨	1.657**	1.485	.172
無黨	1.132*	.840	.292
經濟困境內在歸因	.010	-.090	.096
經濟困境外在歸因	.117**	.223**	-.093
INTERCEPT	18.073	-17.100***	-35.173
LOG-LIKELIHOOD		1179.312	
CHI-SQUARE		63.852	
DF		38	
N		997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籍貫以本省閩南人為對照組；教育程度以國小以下為對照組；

僱用身份以雇主為對照組；政黨屬性以民進黨為對照組。

表 5 為民眾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態度之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可發現：在僱用身份方面，勞工比雇主，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發現支持假設一。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發現支持假設三。在婚姻方面，未婚比已婚的人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較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經濟困境外在歸因越強的人，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越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假設四得到支持。

表 5：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 Multinomial Logit

自變項	同意 VS. 不同意	無意見 VS. 不同意	同意 VS. 無意見
男性	.301	-.178	.479
年齡	-.017	-.009	-.008
外省人	.397	-.131	.528
本省客家人	-.140	-.639	.499
原住民	13.433	-.213	13.646
收入	-.010	.010	-.020
國中	.169	.120	.049
高中	.373	.066	.308

大專以上	.280	.377	-.096
未婚	-.547*	-.729	.182
失去配偶	.034	-.377	.411
自營工作者	.489	.940	-.451
經理	.307	.146	.161
勞工	.730*	.782	-.053
家屬工作者	.584	1.264	-.679
國民黨	1.348*	.856	.492
無黨	.684	.416	.268
經濟困境內在歸因	.014	-.052	.067
經濟困境外在歸因	.155***	.088	.067
INTERCEPT	30.417	.631	29.786
LOG-LIKELIHOOD		1301.798	
CHI-SQUARE		69.343	
DF		38	
N		987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籍貫以本省閩南人為對照組；教育程度以國小以下為對照組；
僱用身份以雇主為對照組；政黨屬性以民進黨為對照組。

表 6 為民眾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態度之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可以發現：在僱用身份方面，家屬工作者比雇主，對

「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發現支持假設一。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程度的人與國小以下程度者相比，高中程度的人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而非無意見。發現支持假設二。在省籍方面，外省民眾與本省閩南人相比，外省民眾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發現支持假設三。經濟困境外在歸因越強的人，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越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經濟困境內在歸因越強的人，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越傾向同意而非無意見。假設四得到支持。

表 6：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 Multinomial Logit

自變項	同意 VS. 不同意	無意見 VS. 不同意	同意 VS. 無意見
男性	.020	-.240	.260
年齡	-.007	.015	-.022
外省人	-.563*	-1.120	.556
本省客家人	.312	-1.119	.528
原住民	-.022	-14.332	14.310
收入	.002	.010	-.008
國中	-.069	-.556	.487
高中	-.490	-1.387*	.897

大專以上	-.436	-.671	.234
未婚	.077	.193	-.117
失去配偶	.047	-1.303	1.350
自營工作者	-.167	.067	-.234
經理	-.081	.142	-.223
勞工	-.109	.555	-.664
家屬工作者	-.643*	.315	-.958
國民黨	-1.233*	-.746	.487
無黨	-.714	-1.029	.315
經濟困境內在歸因	.018	-.082	.102*
經濟困境外在歸因	-.074**	-.018	-.054
INTERCEPT	-3.482	-34.259	-30.777
LOG-LIKELIHOOD		1531.080	
CHI-SQUARE		59.366	
DF		38	
N		988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籍貫以本省閩南人為對照組；教育程度以國小以下為對照組；
僱用身份以雇主為對照組；政黨屬性以民進黨為對照組。

結論與討論

在僱用身份方面，勞工比雇主，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家屬工作者比雇主，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而非同意。

教育可能影響民眾的相關政策態度。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程度的人與國小程度者相比，高中程度的人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

政黨屬性可能影響民眾的政策態度。與民進黨的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無黨人士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無黨人士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較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相比，國民黨支持者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較傾向不同意。

經濟困境歸因可能影響民眾的政策態度。越是傾向對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對「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越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經濟困境外在歸因越強的人，對「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越傾向同意而非不同意。經濟困境內在歸因越強的人，對「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低的工作收入」，越傾向同意而非無意見。這點有重要的意義：顯示民眾之經濟困境歸因會影響其政策態度。

最後，個人背景可能影響民眾的政策態度：外省民眾比本省閩南人同意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更不同意目前政府很努力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此外，在婚姻方面，未婚比已婚的人不同意目前政府對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或許已婚者對工作養家更為重視，這似乎與自利原則有關。不過，限於目前的資料，這只是初步的推測，究竟事實如何，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檢驗。

本文提供了一些有政策意涵的思考，本文發現：研究民眾的人力就業政策態

度，不宜只注意個人背景因素，還應注意困境歸因。困境歸因是影響民眾對相關政策態度之重要因素。對困境傾向做外在歸因與內在歸因的人，其對政策的態度不同。傾向對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較同意：目前政府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努力不夠、目前政府提供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努力不夠。傾向對經濟困境做外在歸因的人，較不同意目前政府很努力的保障保障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收入。

正如 Sigelman and Welch (1991)所指出的：傳統政策往往基於優勢團體如何看待弱勢群體，故有必要研究優勢團體之歸因，因為優勢團體之歸因會影響傳統政策的規劃。以往對弱勢團體問題的政策擬定，往往都是從優勢團體的角度來看的，而弱勢團體主要只是扮演政策輔導的對象，對弱勢團體問題的政策擬定，很少考量弱勢團體對其問題之形成是如何歸因解釋的，優勢團體對弱勢團體往往只有有限的同情。在此情形下，相關之歸因研究有助於了解互動背後之社會心理，也有助於看出相關政策的前景、機會與阻礙(傅仰止 1994)。Kluegel (1990)也發現優勢團體對弱勢團體的同情不夠，由優勢團體主導的保障與再分配政策，可能難以真正改善問題。從優勢團體的角度來規劃的政策，恐怕也難以得到弱勢團體的充分支持。在此情形下，了解不同的人如何對經濟困境歸因解釋，就有相當的意義。隨著近年政黨競爭與選戰逐趨激烈，政策的擬定已越來越不能忽視民意，規劃再好的政策，如果沒有得到民眾足夠的支持，政策將難以成功，故需重視不同群體如何對困境進行歸因。

根據 Rawls(1971)的論點，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主要有兩項原則：其一在於每個人都享有相等的自由權利，其二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安排應給予處境不利的弱勢者較大的利益。保障工作機會相等的權利，較類似 Rawls(1971)的第一項原則。而透過勞動相關政策，使處於弱勢地位者，得到較大的保障，這種做法較近似 Rawls(1971)差異原則之精神。然而以往在相關政策的討論中，很少注意弱勢團體自身如何看待困境的形成，而往往是從優勢團體的角度來解釋弱勢者的問題，忽略了弱勢者對困境問題之歸因解釋，可能不同於優勢團體，而困境歸因可

能影響其對相關勞動政策的態度。這些都是過去台灣在討論公共政策時，較忽視的重要問題。過去的研究較忽略的是：誰來判斷弱勢者的困境成因？困境歸因是否會影響一個人對相關政策之態度？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弱勢者如何看待其困境問題，恐難以真正得到弱勢者的支持並改善其困境。了解弱勢者對困境之歸因，有助於解決困境問題。注意弱勢團體如何看待其困境問題，而不只著重優勢團體的觀點，也比較公平。了解困境歸因對相關政策態度與滿意感受之影響，則有助於政策之推動，這也是本文希望提供相關政策省思之處。

隨著民主化的發展，民眾對相關政策的態度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視，而相關態度實際上可分為幾個面向(Corbett 1991)：

- (1) 方向 (Direction)：民眾對某議題的特定偏向。
- (2) 強度 (Intensity)：民眾對某議題偏好之強度。
- (3) 穩定度 (Stability)：民眾對某議題偏向的穩定程度。

過去相關的研究，多集中在前兩項，而對民眾政策態度的穩定程度則較缺乏深入的分析。民意或大眾意見究竟是不是一貫而穩定的，國際學術界的看法不一。Converse(1964)曾指出，大眾缺乏一貫穩定的意見。Pierce and Rose(1974)重新分析 Converse 的資料而得到不同的結論，認為民意有其一貫性。Cook and Barrett(1992)的研究發現，美國大眾對社會政策的意見是相當一貫而清楚可辨的。林萬億(1995)曾提及民眾在不同時間對一些社會福利問題的看法。呂寶靜(1995)也曾做類似的比較。上述研究皆有其意義，不過可能由於資料的限制，他們主要在分析民眾持某種態度的百分比變化，因而不易了解到底那一種特徵的人變化較大，那一類人較穩定不變，又為什麼？這或許也是今後研究政策態度問題時，值得繼續探討的方向。

最後，限於目前的資料，本文只能探討民眾對傳統就業政策之態度，其實隨著電子通訊設備的急速發展，電傳勞動(telework)等新工作型態已出現，帶來新的思考。所謂的電傳勞動是指「運用電子通訊技術與雇主或同仁聯繫，藉以溝通與傳輸工作成果之勞動方式，而其工作位置通常在雇主之主要營業場所之外或與

委託人所在地點分離」(王 方 2002:159)。電傳勞動對勞動相關政策問題帶來新的啟發，傳統對政府應提供何種保障的思考往往是立基於：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固定雇主、全職工作、且男性居勞動者主體，但電傳勞動帶來重大的改變，不再受限於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與雇主，且女性電傳勞動者的比例也可能增加，政府傳統的政策已不能充分的適用於電傳勞動者。由於不再受限於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與雇主，且女性電傳勞動者的比例也可能增加，加上是否取得傳統受僱勞工身份會對勞工的僱用身份與保障問題有影響，傳統的面臨挑戰。目前政府的相關政策並不能有效的保障每個電傳勞動者都有最基本的工作收入，也難以讓每個想工作的電傳勞動者都有工作，同時不易提供失業的電傳勞動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傳統的政策也難以保障各種電傳勞動者。而是否取得傳統受僱勞工身份更會對勞工的僱用身份與保障問題有影響(註 3)。電傳勞動對傳統的人力就業政策帶來新的挑戰，應如何因應？值得未來研究。

(註 1) 根據過去的文獻，可能影響民眾可能影響民眾政策態度的因素還有效率問題。如 Katz (1986)所言，政策的施行，往往伴隨著效率的辯論。認為政府有效率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滿意，也較可能支持政府之相關保障弱勢政策。而認為政府缺乏效率的人，可能對社會公平較不滿意，也較不可能支持相關保障弱勢政策。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可說是台灣最全面的社會基本調查，非一般個人研究抽樣調查可比擬，然而其缺乏此一變項，這是本研究不得已的限制。

(註 2) 本研究曾針對此主題進行迴歸分析，得到的結果雖與 multinomial logit 的發現，不盡相同，但是頗為類似。

(註 3) 目前政府之人力就業政策主要是針對具有傳統勞工身份者，部分電傳勞

動者可能被企業界定為非正式的，或是自雇勞動者，以承攬關係提供其勞務，因而未能充分取得傳統的勞工相關保障。如未取得傳統的受僱勞工身份，通常與雇主缺乏正式的雇傭關係，缺乏基本工資的保障，也未能享有一般的法定內的企業福利（如退休金、資遣費、社會保險）。電傳勞動者究竟被視為是傳統受僱勞工，或被視為是獨立於企業之外的承攬人，對其保障影響極大。部分電傳勞動者不易判斷其僱用身份，對被企業界定為非正式的，或是自雇電傳勞動者來說，目前政府提供之保障是不足的。由於電傳勞動突破了固定雇主、固定僱用關係、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工會可能無法有效的組織與動員電傳勞動者，加上一般電傳勞動者對工會活動反應往往較冷淡，工會也不易為電傳勞動者爭取保障，在這種情形下，期望靠傳統的工會運動來改善勞工的保障問題，恐有困難。

參考書目

王 方

- 2000 發展、勞動與福利：東亞與拉丁美洲經驗的省思，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鄭宇碩主編：海峽兩岸三地的勞資關係與勞工政策 507-546，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
- 2001 台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之決定因素初探，東吳社會學報第 11 期，頁 137-162。
- 2002 「電傳勞動」對福利的影響：新工作型態對勞工福利帶來的省思，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二期，頁 155-181。
- 2008 福利體系與長期照護難題：外籍看護工問題帶來的省思，就業安全第七卷第一期，頁 97-101。

王甫昌

- 1997 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台灣民眾政策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十年代的台灣社會，頁 249-294。

呂寶靜

- 1995 民意與社會福利，見中華民國現代社會福利協會編輯，台灣的社會福利：民間觀點，頁 67-102，五南出版社。

林萬億

- 1995 影響台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的因素，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三年二月定期調查報告：17-41，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傅仰止

- 1994 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與原住民觀點，中央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77 期：35-87。

關秉寅與黃毅志

- 1997 台灣社會民眾對成就歸因與重分配政策之態度，九零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147-187。

Baldwin, P.

- 1990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teille, A.

- 1969 "The Declin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ndre Beille ed. *Social Inequality: Selected Readings*. Baltimore Penguin.

Bobo, L.

- 1991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ism, and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Social Forum*, Vol 6, No.1.

Bullock, H. E.

- 1999**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A Comparison of Middle-Class (1999) and Welfare Recipient Attitud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10), 2059-2082.

Bullock, H. E., Williams, W. R., & Limbert, W. M.

- 2001** **Attributions,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Support for Progressive Welfare Policies.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Cook, F. L. and E.J. Barrett

- 1992** **Support for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the Views of Congres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e, Philip

-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ited by David E. Apter, pp, 219-227. New York: Free Press.

Cozzarelli, C., Wilkinson, A.V., & Tagler, M. J.

- 2001**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and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2), 207-227.

Deyo, F. C.

-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agin, J.

- 1972** "Poverty 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 Helps Who Help Themselves. " *Psychology Today*, 6:101-129.

Feldman, S.

- 1983**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3-29.

Form W. and C. Hanson

- 1985** "The Consistency of Ideologies of Economic Justice."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239-269.

Furnham, A.

- 1982 "Why Are the Poor Always With Us? Explanations for Poverty in Great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 311-322.
- 1990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and Son.
- Huber, J. and W. Form
1973 **Income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Formula,** Free Press.
- Hunt, M.
- 1996 "The Individual, Society, or Both? A Comparison of Black, Latino and White Beliefs about the Causes of Poverty." *Social Forces*. 75(1):293-322.
- Hyman, H.H. and C.R. Wright
1979 **Education's Lasting Influence on Valu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ckman, M. and M. Muha
1984 "Education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751-769.
- Katz, M. B.
1986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Kluegel, J.R.
1990 "Trends in Whites' Explanations of the Black-White Gap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1977-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4):512-525.
- Kluegel, J.R. and E.R. Smith
1983 "Affirmative Action Attitudes: Effects of Self-Interest, Racial Affect, and Stratification Beliefs on Whites' Views." *Social Forces*, 61, 797-824.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merican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Y: Aldine De Gruyter.
- Ladd, E.C.
1985 **The American Polity: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ew York: W.W.Norton.
- Leach, B.
1989 "Disabled Peopl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67 (Spring) :65-77.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Lewis, O.

Mayer, W.

1992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cClosky, H. and A.Brill

1983 Dimensions of Tolerance. Russell Sage.

Nasser, R. and K. Abouchedid

2001 "Causal Attribution of Poverty among Leb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6(14):205-219.

Pierce, J. C., and D. D. Rose

1974 "Non-Attitud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626-649.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Oxfe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R.V., and W.Bell.

1978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25-43.

Sigelman, L and S. Welch

1991 Black Americans' Views of Racial Inequality: The Dream Deferr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dige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J.L., J.Piereson, and G.E. Marcus

1982 Political Tolera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ng, Fang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in Taiwan." In Democracy, Clientelism and Civil Society:181-205, Edited by Luis Roniger and Ayse Gunes-Ayata. Lynne Rinner Publishers.

Wright, E.O.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Y.: Academic Press.

Wright, E.O. and L. Perrone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32-55.